



西域研究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ISSN 1002-4743, CN 65-1121/C

《西域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反思——帕提亚帝国多元文化属性的合分之辨
作者：龙沛
网络首发日期：2023-06-20
引用格式：龙沛.“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反思——帕提亚帝国多元文化属性的合分之辨[J/OL]. 西域研究.
<https://kns.cnki.net/kcms2/detail/65.1121.C.20230620.1102.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反思

——帕提亚帝国多元文化属性的合分之辨*

龙沛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

内容提要：在帕提亚帝国三大文化属性中，“希腊化”、“内亚性”“伊朗性”的深浅程度和重要性是有差别的。“希腊化”对于帕提亚帝国来说只是风靡一时的外来文化，而“内亚性”与“伊朗性”是帕提亚人自身文化特征中表现得最突出且相互缠绕交织的两大文化维度。“伊朗性”体现在帕提亚帝国在钱币、图像、铭文、建筑和帝国统治观念领域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传统和内亚游牧伊朗人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且在持续时间和后世影响上超过了“希腊化”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因此，“伊朗性”才是理解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和文明交往特征最重要的维度，帕提亚伊朗文化对中古波斯/伊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应被传统的希腊化研究范式所遮蔽。

关键词：帕提亚帝国 文化属性 伊朗性 希腊化 内亚性

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Arsacid Parthia，又称“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是古代伊朗历史和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是公元前后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研究帕提亚史的论著不断涌现，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伊朗古史研究。而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对帕提亚史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帕提亚帝国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深度影响，其主流文化特征是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甚至称帕提亚帝国为“希腊化王朝”^①。然而，帕提亚帝国的部分“希腊化”特征虽然值得肯定，但希腊化范式对于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核心文化属性仍然因为研究视角的局限而力有未

*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LSYZD21021）”子课题“新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以及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罗马波斯战争与古代晚期中东文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2JZ06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研究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特征的国内代表性论著，参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节》，《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王三三：《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王三三：《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历史考察》，《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何彦霄：《重读《卡里娥伊》——兼谈帕提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古代文明》2022年第3期。国内持将帕提亚王朝归为“希腊化王朝”、“希腊化国家”观点的代表是王三三。王三三先生虽指出帕提亚人希腊化的表面性、上层性和不稳定特点，但却始终没有对帕提亚人所谓“自身的文化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停留在揭示帕提亚人起源的“斯基泰渊源”上，但却惜未讨论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与伊朗文化之间的关系。笔者曾撰文对“希腊化王朝”的定义以及王三三先生将帕提亚王朝判定为“希腊化王朝”观点进行初步质疑，但尚未涉及帕提亚王朝区别于传统“希腊化王朝”的真正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国内学界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中“伊朗性”面向的讨论尚未真正展开。参见龙沛：《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王朝论”商榷》，《古代文明》2021年第2期，第17-29页。

逮。帕提亚帝国诞生于希腊化世界，并从塞琉古王朝继承了许多希腊化特征，如希腊语、希腊铭文、希腊式钱币、图像、雕塑和建筑风格等等，部分帕提亚上层贵族对希腊文化亦有青睐熟稔者。可以说，帕提亚帝国具有一定的“希腊化”特征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帕提亚帝国同样也是古代伊朗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帕提亚帝国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帝国之间的渊源和承继关系，以及帕提亚帝国对中古波斯文明发展的作用，同样是当今帕提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尤其是随着当今考古发掘、钱币学材料和伊朗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帕提亚史研究的议题已经逐渐走向多元化。^①但限于史料的局限性，对帕提亚史研究中诸多关键细节问题，学界仍然争论颇多。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伊朗学研究者的努力，至本世纪初国外伊朗学界对帕提亚王朝和萨珊帝国史的研究出现了奥布里希特（Marek Jan Obrycht）^②、拉西姆·沙耶甘（M. Rahim Shayegan）^③、帕尔瓦内赫·博沙利亚提（Parvaneh Pourshariati）和尼科劳斯·奥弗图姆（Nicolaus Leo Overtoom）^④等代表人物。其中，沙耶甘综合利用古典史料、近东楔文资料和古代伊朗铭文对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政治宣传中的复兴阿契美尼德传统（Achaemenid Program）现象进行了独到而深刻地研究；博沙利亚提的萨珊—帕提亚贵族联盟（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理论更有助于理解帕提亚—萨珊时期伊朗历史的连续性^⑤；奥布里希特的新著《早期帕提亚史》综合利用古典学、考古学和伊朗学成果对早期帕提亚政治史诸多疑点进行了颇有见地地论证，而他对帕提亚帝国与中亚草原游牧文化关系的考察，则充分结合了考古证据、钱币学和艺术史材料，从而在帕提亚政治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研究。^⑥

以上学者的著作无疑对将帕提亚研究纳入主流伊朗学研究的新时代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帕提亚研究从属于古典学研究的态势。然而在国外学界，希腊化范式仍然是研究帕提亚史的主流，将帕提亚帝国放在伊朗自身历史发展框架下进行纵向考察的研究成果至今少见。而国内学界在希腊化研究、帕提亚研究乃至伊朗古史研究领域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法、德学者帕提亚史研究成果的引介甚少。^⑦而目前国内引介的唯

^① Henry H. Howorth, "Some Notes on Coins Attributed to Parthia",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Fourth Series, vol. 5, 1905; M. Szynger, "Nouveaux ostraca de Nisa", *Semitica*, XII, 1962, pp. 105-126; Tehmuras D. Anklesaria, *The Bundahisn*, Bombay, 1908; M. Rahmi Shayegan, "Old Iranian Motifs in Vīs o Rāmīn", in Stefan Heidemann, Gottfried Hagen, Andreas Kaplony and Rudi Matthee (eds), *Essays in Islamic Philolog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2016, pp. 29-50; Arthur Melikyan, "The Hypothesis of the Arsacids' Descent from the Achaemenids: Myth or Reali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2021, vol. 2, pp. 31-46.

^② Marek Jan Obrycht, *Early Arsakid Parthia (ca. 250 - 165 b.c.), at the Crossroads of Iranian, Hellenistic, and Central Asian Histo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③ M. Rahmi Shayegan, *Arsacids and Sasanians: Political Ideology in Post-Hellenistic and Late Antique Per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Nicolaus Leo Overtoom, *Reign of Arrows: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in the Hellenistic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⑤ Parvaneh Pourshariati,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asanian Empire: 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 and the Arab Conquest of Iran*, London: I. B. Tauris, 2008, pp. 2-5.

^⑥ Marek Jan Obrycht, "Arsacid Iran and the Normads of Central Asia-Way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Jan Bemmann, Michael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Archaeology, Volume 7,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2015, pp. 333-377.

^⑦ K. Shippmann, *Grundzüge der parthischen Geschichte*, Darmstadt, 1980; J. Wolsky, *L'empire des Arsacides*, Leuven, 1993; J. Wiesehöfer, *Das Partherreich und sein Zeugnisse: The Arsacid Empire: Sources and Documentation*, Stuttgart, 1998; Ursula Hackl, Bruno Jacobs & Dieter Weber (eds),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therreiches, Textsammlung mit Übersetzungen und Kommentar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0.

一部涉及帕提亚史的伊朗学者著作，是已故德黑兰大学教授扎林库伯的《波斯帝国史》。扎林库伯对帕提亚王朝文化性质的基本观点是：“竭力保持希腊化与东方化两种因素的平衡是阿什康尼王朝（即帕提亚帝国）的基本特征”。但他同时也认为，帕提亚王朝的建立是“伊朗的生命力对希腊人统治和希腊化的反驳”^①。因此，国外伊朗学界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成果亟待引介国内，这样才能超越传统希腊化王朝史的视角促进帕提亚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帕提亚史研究应该完全脱离西方古典学的框架展开。实际上，古典史料仍然是帕提亚帝国政治史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而帕提亚史研究视角的突破则离不开伊朗学和内亚学的方法和视野。^②

笔者认为，帕提亚研究“希腊化范式”主要的缺陷和局限性在于，它难以揭示帕提亚帝国自身的核心文化属性。实际上，研究帕提亚的视角和切入点可以有多种选择。“希腊化范式”只能从文化横向传播和可视化元素的角度揭示帕提亚帝国最表面的一些文化特征，而无法深入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深层面向。因此，国内学界若要在帕提亚史研究领域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和成就，必须适当突破“希腊化范式”，探讨帕提亚帝国与伊朗/波斯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帕提亚帝国的其他文化属性尤其是其“伊朗性”的一面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帕提亚帝国囊括了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核心领土，其治下有众多拥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可以说继承了古代伊朗、巴比伦、希腊、叙利亚、斯基泰等各种文化元素和文明传统。希腊人仅仅是帕提亚帝国内部众多族群之一，其人口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从语言和族属上看，帕提亚人是古代欧亚大陆伊朗语人群广大世界中的一员，该人群所操的母语是属于中古伊朗语西北方言的帕提亚语（Pahlavānīg）。^③帕提亚人不仅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出浓厚的伊朗文化特征。如帕提亚人名中包含众多的琐罗亚斯德教神祇名，以

^① [伊朗]阿卜杜勒·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324页。

^② “内亚”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其著作《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用来指称中国的满、蒙、疆、藏四大内陆边疆地区，即“*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也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北族史的常用概念，对应英文“*Inner Asia*”。部分中国史学者将拉铁摩尔的“内亚边疆”理解为“内亚”的全部，其实并非拉铁摩尔的本意。而广义上的“内亚”指的是从中国东北到南俄草原的整个亚欧内陆的草原带，即“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n*）”或“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帕提亚王朝起源于里海东岸的中亚西部的沙漠—草原交错带，因而帕提亚王朝的“内亚”渊源指的是广义的“内陆欧亚”，在空间范围上超过了中国史学者研究中国边疆使用的“狭义内亚”。实际上，国外学者对“*Inner Asia*”概念的使用已经非常接近“*Inner Eurasia*”。如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就将整个欧亚内陆草原纳入研究范围，其第四章即南俄草原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人的历史。而国内学者如余太山等在研究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时一般以“内陆欧亚”来与中国史研究语境中的“内亚”相区别。本文所使用的“内亚”一词的涵义，与中国史学者研究中国北族史和北族王朝所使用的“内亚”相比有所不同，侧重的是欧亚草原带西部地区，即中亚的农牧交错带和南俄草原地区，与大部分国外学者对“*Inner Asia*”的广义定义一致，参见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97-117; Denis 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5; Shirin Akiner, “Conceptual Geographies of Central Asi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p. 3-6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pp. 158-163.

^③ John Sheldo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sian Ethnicity*, vol.7, no.1, (Feb. 2006), pp. 5-16; H. W. 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 in B. Spuler (ed.),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ranistik- Linguistic*, Leiden: Brill, 1958, pp. 131-154;

及帕提亚人的口头文学及其贵族社会对中古波斯文化的影响,都是值得学界挖掘和探讨的方面。因此,只有适当摆脱“希腊化范式”的束缚,站在古代伊朗自身历史发展的主客观环境条件下来研究帕提亚史,才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文化属性和文明特征。对于帕提亚帝国的文化属性而言,理清希腊文化、内亚斯基泰游牧文化和波斯文化所占的比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①本文拟通过对帕提亚帝国全时段文明交往特征的考察,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帕提亚帝国“希腊性”的表现及深度,然后将其与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中的“内亚性”和“伊朗性”特征进行比较互鉴,从而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核心文化属性和帕提亚帝国时期伊朗文明发展的整体趋势,个中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比较的三个维度

“希腊化”是国内学界探讨帕提亚帝国文化特征的主要视角,但在论证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特征时,我们不应将帕提亚帝国的所有文化、物产、经济、风俗、艺术等特征都纳入“希腊化文化”范畴来讨论,也不应对“希腊化”概念进行过度地延伸和泛化^②。而国内主

^① Marek J. Olbrycht, “Parthia et ultiores gentes: 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arsakidischen Iran und den Nomaden der eurasischen Steppen(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sakid Iran and the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2002, pp. 465-469; M. Boyce, “The Sedentary Arsacids”, *Iranica Antiqua*, vol. 29, 1994, pp. 241-251; S. Hauser, “Die ewigen Nomaden? Bemerkungen zu Herkunft, Militär, Staatsaufbau und nomadischen Traditionen der Arsakiden (The eternal nomads?Remarks on Origin, Military, State building and nomadic traditions of the Arsacids)”, in O. Schmitt, M. Sommer(eds), *Krieg, Gesellschaft, Institutionen: Beiträge zu einer vergleichenden Kriegsgeschichte (War, Society, Institutions: Contributions to a Comparative War History)*, Berlin, 2005, pp. 163-208; 国内学者对帕提亚斯基泰渊源的探讨,参见王三三、邵兆颖:《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文献与考古学证据》,《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

^② 如王三三先生在《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一文中,引用汉文史料记载,论证汉代中国已知晓帕提亚帝国采用“希腊化币制”,这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对“希腊化世界”了解程度的加深,而与希腊化文化经帕提亚之手“东渐”入华之间难以建立直接逻辑联系。其次,作者将葡萄、苜蓿和良马三类物产作为可标识为“希腊化文化”的物质的观点欠妥。盖因葡萄、苜蓿和良马都是西亚中亚地方的土产,在前希腊化时代就已经存在。因此,这三类物产本身与“希腊化文化”其实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故以之作为论证“希腊化文化”经帕提亚之手东渐入华的证据说服力不足。而苜蓿传入汉代中国这个案例,即使从语源上看,也与“希腊化文化”关系薄弱,更应该求诸于中古伊朗语的 *muššu*。至于帕提亚的尼西安战马(Nisean Chargers,产于米底),更是帕提亚自身乃至伊朗高原的产物,与“希腊化文化”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作者还例举出土的汉代青海银壶、广州银盒和广西陶壶来证明帕提亚导致的“希腊化文化”东渐,其主要问题仍然是证据相关性薄弱。在作者所列举的这三种文物中,只有青海银壶具有“希腊化”特征且产自帕提亚的观点得到部分国内学者的认同。而作者并未介绍并论证广州银盒、广西陶壶的艺术风格有任何“希腊化特征”,只论证其可能产自西亚的帕提亚。最后,作者还从汉代有翼神兽、狮子、兽首莱通杯和山普拉挂毯四个论据论述“希腊化文化”的东渐。而这四个论据无一能确凿证明这些文物是经帕提亚输入或受帕提亚艺术影响的结果,甚至都不能将其判定为是典型的“希腊化”艺术风格。而且王三三先生有把产自西亚的物质文化元素与“希腊化文化”混为一谈的倾向,所以其论证自然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希腊化文化”乃至“希腊化文明”的东渐,必须是与希腊元素直接相关的文本、艺术、宗教、物产、思想等能够直接体现希腊文明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元素的入华,如《荷马史诗》、希腊宗教和神祇、希腊神话、希腊戏剧、希腊建筑、希腊式的图像、希腊语言、希腊字母、希腊哲学、希腊物产、希腊史学等等。另外,汉代中国了解帕提亚帝国,主要是张骞凿空的结果,因此王三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证明帕提亚帝国在“希腊化文化”东渐过程中自身发挥了何种有意识的主动作用。参见王三三:《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第99-110页。

流学界均认为，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的最大依据就是从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 前 171-前 138 年在位）开始的帕提亚诸王钱币上几乎均有“希腊之友（ΦΙΛΕΛΛΕΝΟΣ, Philhellene, 即“爱希腊”）”的铭文^①。的确，帕提亚帝国在米特里达梯一世时期扩张至两河流域后，面对以塞琉西亚为首的当地众多希腊化城市，帕提亚诸王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标榜对希腊文化的仰慕以笼络被征服的希腊化城市并获得当地希腊上层精英的诚心拥戴，对游牧民族起家、缺乏统治高度发达文明地区经验的帕提亚人来说非常有必要^②。但是以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安提柯王朝为代表的“标准”希腊化王朝，由于本身统治族群为希腊—马其顿裔，根本无须在钱币上证明自己是“希腊之友”。而考察作为“第二代希腊化王朝”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也从未在其钱币上宣示过“Philhellene”。由此不难看出，帕提亚帝国的“爱希腊”钱币特征不符合一般希腊化王朝钱币传统，实际上是有着内亚游牧文化渊源的帕提亚人为减轻自己统治希腊化地区的阻力“有意为之”。也就是说，帕提亚帝国的“爱希腊”口号从反面充分体现出自己族群乃至文化出身的“非希腊性”，正所谓“欲盖弥彰”^③。而如果考察与帕提亚有着同样东方族源背景的本都米特里达梯王朝（Mithridatids, 前 302-前 63 年）和亚美尼亚阿塔西亚德王朝（Artaxiades, 前 190 年-12 年），便会发现“Philhellene”更应该是东方帝国在希腊化时代对其境内希腊族群采取的“公关手段”，而非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等正统希腊化王朝的身份标识。而从公元 1 世纪初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II, 10-38 年在位）开始，帕提亚帝国君主发行的钱币不再出现“希腊之友”铭文。由此可以判断，“爱希腊”对帕提亚帝国统治的维持并非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口号，更难以得出帕提亚人自身在文化和族群认同上深度希腊化的结论。

国内学者在强调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特征”的同时，也强调过帕提亚帝国的“斯基泰渊源”。因此，草原斯基泰文化代表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成为解读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又一主流趋势。从帕提亚君主发行的钱币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载来看，草原游牧文化的

^① Edward Dabrowa, *Studia Graeco-Parthic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pp. 79-84.

^② E.Dabrowa,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the first Arsacids and its targets(from Arsaces I to Mithridates II)”, *Parthica*, 10, 2008, pp. 25-31.

^③ 国内学界对帕提亚王朝的“希腊化”特征长期存在一定程度的泛化和误读倾向，并且对帕提亚王朝、帕提亚人、帕提亚语等概念界定不够清晰。如王三三先生的《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帕提亚人是古典作家对阿萨息斯王朝缔造者的统称”，似乎武断地将“帕提亚人”定义为阿萨息斯王朝的缔造者。作者忽略了早期古典作家笔下的帕提亚人指阿契美尼德王朝帕萨瓦（Parthava）行省土著居民。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古典作家（如斯特拉波、查士丁、塔西佗等）记载的“帕提亚人”，则是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族群，里面已经融合了早期的帕提亚土著、米底人和斯基泰人、塞种人的血统。而在王三三先生的《帕提亚帝国的斯基泰渊源：文献与考古学证据》中，作者以斯基泰渊源为由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人与帕提亚王朝的帕提亚人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显然忽视了阿帕尔尼游牧入侵者与帕提亚土著居民相同化、形成内涵更加丰富的“帕提亚人”的历史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将帕提亚帝国的帕提亚人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帕提亚人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是有失偏颇的。盖因帕提亚土著人群和伊朗高原西北部的米底人在帕提亚帝国和“帕提亚人”的族群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参见王三三：《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历史考察》，第 30 页；Mehrdad Ghodrat-Dizaji, “Remarks on the Loc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Parthia in the Sasanian Period”, in V. S. Curtis, Elizabeth J. Pendleton, Michael Alram and Touraj Daryaee (eds), *The Parthian and Early Sassanian Empires: Adaptation and Expansio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in Vienna, 14-16 June, 2012,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Series*, Oxford &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6, pp. 42-46.

一些表层因素确实对帕提亚帝国产生了影响，并集中表现在帕提亚人的“骑射风俗”上面。早期学者认为，帕提亚开国君主阿萨西斯一世的钱币正面为头戴巴什里克帽（Bashlyk）的国王侧面像，而这种尖帽应该是由斯基泰式尖帽演化而来。另一个帕提亚帝国“内亚性”的证据是，帕提亚君主钱币的反面经常可见到右手持弓的国王侧面坐像^①。从表面上看，阿萨西斯一世钱币上具有浓厚“内亚”特色的服饰（巴什里克帽）和器物（复合弓）才是帕提亚艺术受到斯基泰草原艺术影响的直接体现^②，宣示出帕提亚人原初的“内亚”文化特色，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帕提亚帝国具有“斯基泰渊源”的重要证据。但这种观点近年来已经遭到奥布里希特等学者的修正，早期帕提亚君主头戴的软帽并非斯基泰人常见的护耳毡帽，与斯基泰贵族流行的高耸尖帽之间更有巨大的差距，而应是波斯帝国行省总督铸币像中极其常见的 Kyrbasia 软帽，因此早期帕提亚钱币上的国王服饰特征反映的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铸币传统^③。

对于帕提亚持弓坐像钱币的宗教象征意义，法国伊朗学家葛乐耐（Franz Grenet）指出，帕提亚君主钱币背面的持弓坐像很可能是在继承塞琉古王朝阿波罗崇拜的基础上将伊朗太阳神密特拉与阿波罗相混同的图像表现，未必是斯基泰游牧文化的影响所致。库尔提斯（Vista Sarkhosh Curtis）也认为，“持弓坐像”其实源自阿契美尼德传统，因为帕提亚诸王钱币背面持弓坐像也与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诸总督发行的钱币背面持弓坐像极为类似。显然早期帕提亚诸王便知晓前朝铸币传统，因而直接模仿了过来。再如米特里达梯一世之后帕提亚诸王钱币背面出现的希腊城市女神狄科（Tyche）的“右手托胜利女神（Nike）”坐像。初看起来，这是帕提亚帝国统治两河流域初期为笼络当地希腊人采取的宣传手段，与“希腊之友”的铭文表达的是同样的帕提亚人的政治爱希腊主义（Political Philhellenism）。但对狄科女神托胜利女神坐像的解读同样不必拘泥于希腊文化语境，而可以解读为伊朗王权灵光神将统治合法性赐予帕提亚君主的象征，即城市女神 Tyche 其实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灵光神 Farr 的“希腊化呈现（Hellenistic Interpretation）”方式而已。如果对帕提亚诸王钱币进行全时段考察，会发现公元前 2 世纪帕提亚钱币背面盛行一时的狄科女神坐像至公元前 1 世纪后又逐渐重回国王右手持弓坐像，如奥罗德一世钱币和帕提亚末王阿塔巴努斯四世钱币。因此，体现希腊—伊朗宗教混同趋势的“阿波罗—密特拉持弓坐像”再次成为中晚期帕提亚钱币的重要内涵^④，代表帕提亚钱币“希腊化”特征的狄科女神坐像至公元 1 世纪后已经不再见诸帕提亚诸王钱币。因此，如果以狄科女神的图像作为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证据，那么帕提亚帝国统治者“去希腊化”之心在公元 1 世纪之后可谓昭然若揭。实际上，帕提亚时期伊朗人对希腊神形象的理解往往会发生“伊朗化”，如考古学者发现于贝希斯敦山岩上的赫拉克勒斯雕像，在伊朗文化语境下应该被解读为琐罗亚斯德教的胜利战神维瑞斯拉格纳（阿维斯塔

^① M. Abgarians and D. Sellwood, “A Hoard of Early Parthian Drachm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1966-), Seventh Series, vol. 11, 1971, pp. 103-119.

^② V. S. Curtis, “Parthian culture and costume”, in J. Curtis (ed.),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Rejection and Revival c.238 BC-AD 642, London, pp. 23-34.

^③ Vista Sarkhosh Curtis, “The Iranian Revival in the Parthian Period”, eds., Vista Sarkhosh Curtis, Sarah Stewart: *The Idea of Iran: The Age of Parthians*,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p. 9.

^④ Alberto M. Simonetta, “A Proposed Revision of the Attributions of Parthian Coins Struck during the So-called ‘Dark Age’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ast and West*, vol. 51, no. 1/2, Jun. 2001, pp. 69-108.

语 Verethragna, 中古波斯语 Vahrām)。因此, 我们不应该将帕提亚帝国时期各种可视化的希腊元素单纯理解为“希腊化”的影响, 而应结合伊朗本土文化语境发现披着希腊外衣的“伊朗神”, 从文化涵化而非文化输出的角度理解外来的希腊文化与伊朗本土文化的交往关系。

从钱币上看, 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渐消退态势的同时, 而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伊朗性”。自弗拉特斯一世 (Phraates I, 前 176-171 年在位) 起, 帕提亚诸王钱币上国王头像由希腊式的无须洁面特征明显转变为“东方式”和“伊朗式”的蓄须盘发 (典型的波斯式“颗粒状”发体) 特征, 脸部轮廓也从希腊式的柔和俊朗演变为波斯式的充满立体感的“钩鼻深目”; 而从阿塔巴努斯一世 (Artabanus I, 约前 127-124 年在位) 起, 帕提亚诸王钱币上国王不再身穿希腊式外套 (Chiton), 而是向波斯式 V 领短上衣 (显然是束腰长外套的一部分, 即所谓的帕提亚式短裤上衣) 回归; 继阿塔巴努斯一世之后, 米特里达梯二世 (Mithridates II, 约前 123-87 年在位) 以来的帕提亚诸王钱币又进一步凸显其东方伊朗式王权传统的形象特征: 国王侧面像开始蓄长须、戴护耳高圆顶王冠 (Kolah)、耳后下垂波浪式卷帘状珍珠式发体并呈现出典型的帕提亚“三分式”发型 (Tripartite Hairstyle)^①, 彰显出帕提亚人逐渐抛弃“希腊化”传统和并向“伊朗”传统回归^②。由此可见, 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并不持久, 来自阿契美尼德王朝铸币传统的“伊朗”特色才是帕提亚钱币的核心特征。

与“希腊化”相比, 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似乎更加凸显, 但古典史家对帕提亚帝国源自斯基泰人的游牧文化传统往往停留在刻板的偏见性认知中, 而传统学界同样未能突破古典学视角深入审视帕提亚帝国“内亚性”的制度与文化意涵。从军事体系来看, 帕提亚帝国受草原游牧人骑兵战术影响深刻^③。帕提亚人的具装重骑兵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Κατάφρακτος”和“Clibanarii”, 其含义分别为“全身包裹的”和“火炉人”^④。罗马史学家查士丁对帕提亚铁甲骑兵的装备也有着详尽的描述: “他们的铠甲由一片片互相叠置的环片金属制成, 就像鸟的羽毛一样同时覆盖骑手和战马全身”。现代学者多认为, 帕提亚铁甲骑兵的出现是数世纪以来伊朗语游牧民族骑兵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与早期伊朗语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军事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希罗德德曾记载生活在锡尔河北岸的马萨格泰人 (斯基泰人的一支) 已经大规模使用马铠, 而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看来, 帕提亚帝国军事传统中似乎具备了鲜明的“斯基泰”游牧文化因素。帕提亚军事体系的

^① V. S. Curtis, “Parthian costume and headdress”, in J. Wiesehöfer(ed.), *Das Partherreich und seine Zeugnisse*,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vol. 122, Stuttgart, 1998, pp. 61-67.

^② D. G. Sellwood, “The Parthian Coins of Gotarzes I, Orodes I and Sanatruce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Seventh Series, vol. 2 .1962, pp. 73-89; Alberto M. Simonetta, “Some Remarks on the Arsacid Coinage of the Period 90-57B.C.”,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Seventh Series, vol. 6 ,1966, pp. 15-40; J. Dilmaghani, “Parthian Coins from Mithridates II to Orodes II”,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vol. 146, 1986, pp. 216-224.

^③ J. F. Downs, “Origin and Spread of Riding in the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3, 1961, pp. 1193-1203; Laszlo Torday, *Mounted Archers: The Beginnings of Central Asian History*, Durham Academic Press, 1998.

^④ Valerii P. Nikonorov, “Cataphracti, Catafractarii and Clibanarii: Another Look at the old problem of their Identifications”, *Military Archeology: Weapons and Military Affairs from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5 September, 1998, St. Petersburg*, pp. 131-138.

“非希腊”特征同时也是保证其坚定向“东方化”靠拢和回归的内在基础。由于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不依赖希腊式武装和希腊兵源,这便可以解释公元1世纪后其境内的希腊人地位每况愈下以至于最终被当地土著居民完全同化的历史命运。因此,帕提亚帝国完全依赖以骑兵为主的军事体系似乎是其“内亚性”最直接的外在体现。

然而,骑兵传统并非草原斯基泰文化所独有,以伙伴骑兵闻名于世的马其顿王国自不必说,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也同样重视发展骑兵,从米底山区牧场培育的尼西安战马(Nisean Chargers)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均青睐的重装骑兵战马。因此,尼西安战马是古代伊朗重装骑兵专属用马,得名于米底西部扎格罗斯山区的大片草场。因此,至少从马种培育来看,波斯本土的重装骑兵与斯基泰人的军事传统应没有直接关系,而应被视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自身延续下来的传统。尼西安战马常被国内学者错误翻译为“尼萨马”,然而此战马产地与帕提亚旧都尼萨(Nisa)并非一地。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已经开始驯养尼西安战马;斯特拉波也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在米底就常年维持着5万匹母马的培育规模,并指出这些马现在叫做“帕提亚马”^①。而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提到波斯帝国辖下的巴克特里亚人只以盛开的花卉喂养他们的尼西安战马^②。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的特点在于其武装力量几乎全部由铁甲骑兵和弓骑兵构成,其兵源分别来自帕提亚上层大贵族(即帕提亚贵族世家“Pahlav”)和依附于大贵族的低阶帕提亚小贵族及自由民(波斯语“Azātān”)^③。另外,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29-128年因接纳叛变的塞琉古王朝希腊雇佣兵造成的军事灾难可以从反面印证帕提亚军事体系的非希腊性^④。而帕提亚诸王此后几乎不再信任希腊雇佣兵,全面采用铁甲骑兵与弓骑兵结合的战术体系,从而取得了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对罗马军团的完胜。由此可见,帕提亚帝国成熟时期的军事体系所表现出的彻底的“去希腊化”特征。

另一个常被用以论证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证据来自普鲁塔克,即卡莱战役后帕提亚人将克拉苏的首级用做表演欧里庇得斯悲剧《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的“道具”。帕提亚人在战后将克拉苏的首级割下作为与亚美尼亚国王观赏希腊悲剧的“实体道具”,后又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的喉咙以讽刺其贪婪^⑤。对于帕提亚人这一行为的解读,同样可

^① Herodotus, *Histories*, VII. 40.2-3; Strabo, *Geography*, XI. 13. 7.

^②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trans.P.A.Bru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III. 8. 6; Decker, Michael, “horses and donkeys”, in Nicholson, Oliver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ate Antiqu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S. Hause, “Was Their No Paid Standing Army? A Fresh Look o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Arsacid Empire”, in M. Mode, J. Turbach (eds), *Arms and Armour as Indicators of Cultural Transfer. The Steppes and the Ancient World from Hellenistic Time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Wiesbaden, Reichert, 2006, pp. 295-319.

^④ 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二世(Phaates II)为对抗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VII Sidetes)的东征大军,临时招募了中亚塞种(Saka)游牧部落加入其军队。但塞种雇佣兵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帕提亚人便击溃了塞琉古军队获胜。战后弗拉特斯接纳了塞琉古军队中的大量希腊士兵,而塞种雇佣兵由于无法得到弗拉特斯事先承诺的军饷而叛乱。与此同时,帕提亚军队中的塞琉古希腊降兵也跟着一起反叛。弗拉特斯二世措手不及,遂战死于乱军之中。参见 Kay Ehling,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päten Seleukiden (164-63 v. Chr.)*, Stuttgart, 2008, p. 204;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XLI. 38.

^⑤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XL. 27.

以分别从“希腊性”“内亚性”和“伊朗性”三个维度入手：首先，帕提亚上层精英熟悉希腊文化，观看希腊戏剧，似乎是帕提亚人“希腊化”的明证。但“希腊化”总是有深浅之别的，能观看欣赏希腊戏剧是否是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程度达到很深的证明呢？笔者认为，希腊文化中的一些大众化的“流行元素”出现于这一时期东方君主的宫廷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希腊化程度的深浅分水岭应该是观察东方族群是否采用希腊语的人名。如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犹太哈斯蒙尼王朝君主采用“亚历山大（Alexandros）”“梅涅劳斯（Menelaos）”“伊阿宋（Jason）”这样的希腊式人名，而埃及和巴比伦的当地精英往往拥也拥有希腊语名字。反观帕提亚人几乎没有任何君主、贵族和普通平民采用希腊人名，都是清一色的伊朗语人名，如阿萨西斯（Arsaces/Arshaka）、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Mehrdad）、弗拉特斯（Phraates/Farhad）等等。因此，观看戏剧只能证明帕提亚贵族接受了希腊化时代的流行文化，而不能证明帕提亚人在族群认同的深层接受了希腊文化。

而从“内亚”视角来看，游牧民族历来就有将战败者首级割下作饮器和纪念物之传统，如马萨格泰女王以鲜血浸泡居鲁士的头颅、匈奴单于以月氏王头颅为酒器等等。帕提亚早期诸王对待塞琉古战败君主尚具有希腊式的温文尔雅，如米特里达梯一世对塞琉古德米特里二世的处置^①。但至卡莱战役后帕提亚人对克拉苏的处置则明显“东方化”，这似乎标志着帕提亚人的“内亚”军事文化的露骨彰显，是对罗马人东方霸权主义的强力回应^②，即帕提亚人借“希腊”文化之壳表达自己的“内亚”文化之实，并带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强烈反讽意味。但以“内亚”视角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即帕提亚人并没有将克拉苏的首级作为“酒器”使用，因此这一举动与传统的草原游牧贵族处置战败者的风俗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其实，我们在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时，应该注意到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喉咙这一情节的伊朗文化背景。^③盖因这种处刑方式非常吻合琐罗亚斯德教的末日审判和罪罚观念，也被萨珊王朝沿习于对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的处置方式：根据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记载，在埃德萨战役中被俘的罗马皇帝瓦勒良在波斯的结局极为凄惨，即“被波斯人灌入融化黄金后剥皮实草并献祭于波斯火庙^④”。萨珊波斯人对战败被俘罗马皇帝的处刑方式与帕提

^① 公元前139年，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 Nicator）东征帕提亚，被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俘虏。米特里达梯二世以王室规格礼待德米特里二世，并将其女儿罗多古涅嫁（Rhodogune）给他为妻。而十年后的公元前129年，塞琉古王朝在埃克巴坦那与帕提亚军队爆发决战，安条克七世战败身亡。获胜的弗拉特斯二世为其举行王室葬礼，并将他的遗体盛于银质棺槨内一并送还塞琉古王朝。参见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XLI. 39; Rüdiger Schmitt ed., “Rhodogune”, *Encyclopaedia Iranica*, 访问时间: 2019年8月19日; Rahim M. Shayegan, “On Demetrius II Nicator's Arsacid Captivity and Second Rul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 17, 2007, pp. 83-103.

^② David Frendo, “Roman Expansion and the Graeco-Iranian World: Carrhae, Its Explanation and Aftermath in Plutarch”,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17, 2003, pp. 71-81; Susan P Mattern-Parks, “The Defeat of Crassus and the Just War”,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96, no. 4, Sum. 2003, pp. 387-396; M. J. Tucci, *The Battle of Carrhae: The Effects of a Military Disaster on the Roman Empire*, Columbia, Massachusetts, 1992, p. 24.

^③ 以前学者没有注意到的是，有波斯文化渊源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对战败罗马官员将领的处置方式与帕提亚人对克拉苏的处罚惊人地相似，也是采用“熔金灌顶”之法。参见 Appian, *The Mithridatic War*, 5. 22.

^④ 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5, Fletcher, pp. 302-303.

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有一个核心共同之处，即以融化的金属对被惩罚的对象施刑，而中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也有“烧铁灼舌”判定罪犯是否说谎的记载。因此，从对克拉苏的处置方式这一经典历史情节来看，帕提亚帝国对伊朗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层面。对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仪轨的传承并非是萨珊波斯人刻意“复兴”的结果，而是奠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波斯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帕提亚帝国时期的延续，由此可以看出波斯文明的许多核心因素在帕提亚帝国时期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得到了相当深度的传承和发展。

二、从城市建设和王权观念看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

由于希腊化文明的维持和传播主要通过希腊式新建城市进行，因此，如何对待希腊化王国留下的希腊城市是观察帕提亚帝国是否深度“希腊化”的重要指标。帕提亚帝国对塞琉古王朝留下的希腊城市虽然也不加干预任其自治，但帕提亚人从未将希腊城市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而是有着自己完全独立的城市和首都体系。帕提亚国家首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逐渐西南移并最终固定在两河流域的过程。早期帕提亚国家首都位于里海东岸科佩特山北麓的老尼萨（Old Nisa）^①。随着帕提亚人逐渐向西扩张，赫卡尼亚的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os）^②和米底的埃克巴坦那（Ecbatana）相继成为帕提亚王室驻跸地。没有固定的首都是早期帕提亚国家“内亚”性的重要体现，但拥有多个首都以适应不同季节和帝国管理的需要同样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已有的传统，不必认为完全是内亚游牧文化影响所致^③。从帕提亚首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帕提亚国家的首都没有一座是继承塞琉古王朝的希腊新建城市，而都是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就存在的波斯城市或帕提亚人自己发展起来的都市。随着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将其领土扩展至城市稠密且有着高度发达文明的两河流域地区，帕提亚诸王意识到有必要确立一个稳定的主要首都，以控制这个东方帝国辖下的广大地区。另外，公元前130-120年代塞种游牧民族自中亚的频繁迁徙和入侵，也使得帕提亚人寻求一个稳固安全设防首都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而帕提亚人最终选择在底格里斯河东岸营建新都泰西封（Ctesiphon）。

帕提亚人建造泰西封与希腊化王朝君主建设“希腊化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希腊化城市的建立一般伴随着希腊—马其顿定居者的迁入，且这些城市一般具备剧院、体育场、公民大会广场等希腊城邦传统功能建筑。而泰西封的主要人口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当地人群以及逐渐定居于此的王室贵族，其皇宫建设和城区布局看不出典型希腊式城市的风格。^④考察帕提亚—萨珊帝国近七百年对以泰西封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城市群建设和统治历程可以发现，正是泰西封逐渐取代了塞琉西亚作为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中心城市地位，并开启了两河流域城市群的“去希腊化”和“东方化”进程。^⑤泰西封的建城最早应追溯到公元前141年，当

^① A. Invernizzi, “Representations of Gods in Parthian Nisa”, *Parthica*, vol. 7, 2005, pp. 71–80.

^② John Hansman & David Stronach, “Excavations at Shahr-i Qūmis, 197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4, pp. 8–22.

^③ S. Hauser, “Die ewigen Nomaden? Bemerkungen zu Herkunft, Militär, Staatsaufbau und nomadischen Traditionen der Arsakiden”, pp. 163–208.

^④ E. Meyer, “Seleukia und Ktesiphon”,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zu Berlin*, vol. 67, 1929, pp. 1–26.

^⑤ J. Upton, (1932), “The Expedition to Ctesiphon 1931–1932”,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27, no. 8, 1932, pp. 188–197.

时帕提亚军队夺取了塞琉古王朝的东都——两河流域最大的希腊化城市塞琉西亚。塞琉西亚本是塞琉古王朝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在经略两河流域和东方诸行省期间建造的首都，其目的在于吸引希腊移民并抵消巴比伦作为两河流域传统都会的影响力^①。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塞琉西亚成为希腊化世界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的安条克并驾齐驱的大都市。公元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塞琉西亚人口达到60万，可见其规模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东方帝国的首都^②。然而，作为已经统治从伊朗高原到两河流域地区的广阔帝国，帕提亚人并没有顺势将都城移至塞琉西亚，而是在塞琉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即东岸）驻军监视该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帕提亚人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军营发展成为其后来的首都（准确来说是冬都）——泰西封^③。从此之后，泰西封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塞琉西亚两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成为帕提亚—萨珊王朝近七百年的统治中心，并发展成以自身为中心的大都会城市群，即阿拉伯人所说的“麦达因”（al-Mada'in，意为“诸城”）。斯特拉波认为，帕提亚人定都泰西封的原因是“以免（帕提亚人定居塞琉西亚）使得塞琉西亚人受到斯基泰佬的惊扰和压迫，帕提亚人可以在泰西封贩卖他们喜欢的货物并发展属于他们的艺术风格，且该地（泰西封）空气清新适合作为帕提亚国王的冬驻地。”^④

20世纪西方考古学家对泰西封遗址的发掘表明，泰西封是一座以波斯文化为主体的城市，其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⑤。尤其是奠基于帕提亚时期并成熟于萨珊时期的皇宫正殿塔克·基斯拉（Taq Kisra）拱券，是典型的波斯“伊万（Iwan）”式建筑风格^⑥。不仅如此，以泰西封为代表的帕提亚城市还逐渐将其艺术风格扩展至帕提亚在两河流域的众多附属王国，如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侧的哈特拉（Hatra）王国^⑦，其神庙建筑便受到帕提亚“伊万”式拱券的强烈影响^⑧。而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彻底焚毁塞琉西亚后，泰西封作为两河流域核心城市的地位彻底稳固。至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崛起后，阿达希尔一

^① John D. Grainger, *Seleukos Nikator: Constructing a Hellenistic Kingdo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6.

^② Pliny, *Natural History*, VI. 122.

^③ K. Farrokh, “The rise of Ctesiphon and the Silk Route”, *Shadows in the Desert: Ancient Persia at War*,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p. 125-126.

^④ Strabo, *Geography*, XVI. 1.16.

^⑤ K. Schippmann, “Ktesiphon-Expedition im Winter 1928/29”, *Grundzüge der parthischen Geschichte (in German)*. Darmstadt, 1980, p. 62; A. Invernizzi, “Ten Years Research in the al-Mada'in Area, Seleucia and Ctesiphon”, vol. 32, Sum., 1976, pp. 167-175; Otto Kurz, “The Date of the Taq-i Kisr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73, 1, 1941, pp. 37-41.

^⑥ Cristina Bonfanti, Filiberto Chiabrando, Carlo Lippolis and Vito Messina, “Mega-Sites' Impact on Central Mesopotamia: Archaeological and Multi-Temporal Cartographic Study of the Al-Mada'in Area”,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June 9-13, 2014, University of Basel. Volume 2: Egypt and Ancient Near East - Perceptions of Alterity, Ancient Near Eastern Traditions vs. Hellenization/Romanization, Reconstructing Ancient Eco-Systems, Islamic Sessio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6, pp. 251-264.

^⑦ Harald Ingholt: *Parthian sculptures from Hatra: Orient and Hellas in art and religion*, The Academy, New Haven, 1954.

^⑧ Michael Sommer, *Hatra.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caravan city in Roman-Parthian Mesopotamia*, Mainz, 2003.

世（Ardashir I, 224-240年在位）更将塞琉西亚旧址按照波斯风格重建为“韦赫—阿达希尔（Veh-Ardashir）”。尽管在同时期罗马—拜占庭文献对萨珊帝国首都的称谓中，仍然保留了“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的“双城”名号，但这时的“塞琉西亚”早已不是希腊化时期的“塞琉西亚”了。因此，帕提亚时期以泰西封为代表的“东方化”城市的出现为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式城市在两河流域南部和伊朗高原地区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基础^①。由此可以看出，“非希腊城市”的建设是帕提亚—萨珊王朝统治者推动“去希腊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泰西封实际上可称为希腊化时期中东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去希腊化”的城市，充分体现了帕提亚帝国的“非希腊性”和“伊朗性”。

除首都选址外，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还体现在对由古代西亚传统王号发展而来的波斯君主专属徽衔——“王中之王（King of Kings）”称号的回归上。从米特里达梯一世起，帕提亚诸王开始使用“王中之王”的称号，并在米特里达梯二世以后开始频繁使用^②。帕提亚“王中之王”在钱币和巴比伦天文日志中分别为希腊语的“ΒΑΣΙΛΕΙΟΣ ΒΑΣΙΛΕΙΩΝ”和阿卡德语的“Šar Šarrāni”^③。“王中之王”是亚述帝国以来西亚最高统治者的常见称号^④，并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定制化”，成为每一位波斯君主的必要徽号。其实，“王中之王”的本意并非指统治着许多附属国王的最高国王，而是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的父亲……都是国王，所以我也国王”。正如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说的“我，大流士，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波斯之王，诸国之王，叙斯塔斯佩斯之子，阿尔萨米斯之孙，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⑤以及亚美尼亚凡城出土的薛西斯一世铭文所说的“我，薛西斯，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操不同语言的诸省之王，大地所及之王，阿契美尼德家族大流士国王之子”。概言之，“王中之王”称号凸显了西亚王权自古以来强调父系血缘继承关系的特色，即有着强烈西亚特色的“传统型权威”^⑥。而由马其顿君主制发展而来的诸希腊化王朝在王权观念上尽管致力于“东方化”，但绝大部分希腊化君主均不采用“王中之王”称号^⑦。即使如亚历山大这样的世界征服者，也只采用了“亚洲之王”这样的称号^⑧。而塞琉古君主更多地采

^① St. J. Simpson, “Mesopotamia in the Sasanian Period: Settlement patterns, arts and crafts”, in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ed., J. Curtis, London, 2000, pp. 57-66.

^② J. Wiesehöfer, “‘King of kings’ and ‘philhellên’: kingship in Arsacid Iran”, in P. Bilde et al (eds), *Aspects of Hellenistic Kingship*, Aarhus, 1996, pp. 55-66.

^③ R. J. Van der Spek, “Cuneiform documents on Parthian history: The Rahimesu archiv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J. Wiesehöfer (ed.), *Das Partherreich und seine Zeugnisse*,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22, 1998, Stuttgart, pp. 205-258.

^④ Lowell K. Handy, *Among the host of Heaven: the Syro-Palestinian pantheon as bureaucracy*. Eisenbrauns, 1994, p. 112.

^⑤ Greenfield. C. Jonas and Bezalel Porten, *The Bisitun Inscription of Darius the Great: The Aramaic Version*,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I, volume 4, Text 1., London: Percy Lund, Humphries & Co.Ltd., 1982.

^⑥ V. S. Curtis, “Parthian coins: kingship and divine glory”, in P. Wick, M. Zehnder (eds), *The Parthian Empire and its Religions: Studies in the Dynamics of Religious Diversity. Das Partherreich und seine Religionen: Studien zu Dynamiken religiöser Pluralität*, Pietas 5, Gutenberg, 2012, pp. 68-81.

^⑦ Alfred R. Bellinger, “The Bronze Coins of Timarchus, 162-160B.C.”, *Museum Notes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vol. 1, 1945, pp. 37-44.

^⑧ Ernst Fredricksmeier, A. B. Bosworth; E. J. Baynham, (ed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Kingship of Asia. Alexander the Great in Fact and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6-166.

用“大王（ΒΑΣΙΛΕΙΟΣ ΜΕΓΑΝΟΥ）”称号^①，始终不愿接纳西亚的以“王中之王”为核心符号的王权观念。国内有学者认为，帕提亚帝国采纳“王中之王”称号的原因是帝国内部有众多的臣属国王，而塞琉古王朝以总督管理行省，帝国治下并无附庸国王，故其君主无需称“王中之王”^②。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同样采用行省总督制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君主采用“王中之王”的称号。因此，帕提亚帝国复兴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王中之王”称号并将之传递给后世伊朗诸帝国，个中缘由当与古代伊朗王权观念有深刻的关联，而非仅仅是帕提亚帝国时期对附属王国进行宗主统治的现实需要使然。古代伊朗人将宇宙设想为由七块大陆（Haft Keshvar）构成，而伊朗人的王国位于最大的中央大陆。因此，伊朗君主视自己为地上七大气候带之主（King of the Seven Climes），犹如琐罗亚斯德教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六大从神的“七位一体”关系。因此，“王中之王”称号除了体现伊朗王权嬗递的血缘合法性外，也完美契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天下世界观念。^③

三、帕提亚—罗马关系对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塑造

尽管帕提亚王朝的“伊朗性”和“波斯性”缺少文献和实物史料的证明，但古典作家的记载和其他实物史料仍然足以说明帕提亚王朝对阿契美尼德波斯遗产的尊重、拥护和继承，并且以之作为对抗罗马帝国的重要意识形态。但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帕提亚与罗马帝国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帕提亚帝国的“去希腊化”进程和“伊朗化”复兴。其中，帕提亚帝国对收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旧疆的宣示与实践以及大力支持“帕提亚特色”伊朗文化的传播可资为证^④。

在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的早期交往中，罗马一方一度将帕提亚作为“东方小国”对待，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强势和傲慢姿态^⑤。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初次相遇，时任西里西亚（Cilicia）总督的苏拉以罗马属国规格招待帕提亚使臣奥罗巴祖斯（Orobazus），致使米特里达梯二世以有辱国威为由将奥罗巴祖斯使团全部成员处斩^⑥。公元前66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三世（Phaates III，前70-前58年在位）派使者至罗马东方全权统帅庞培处商议恢复幼发拉底河作为两国边界，庞培傲慢地以“两国边界应由罗马人的意志来确定”回应^⑦。而公元前55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单方面撕毁罗马—帕提亚延续四十年之久的和平友好协定（Foedus Amicitiae）入侵帕提亚，则彻底激怒了帕提亚人^⑧。

^① G. K. Jenkins, “Notes on Seleucid Coin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Sixth Series, vol. 11, no. 41, 1951, pp. 1-21.

^② 李潇：《帕提亚“众王之王”钱币的起源、发展及影响》，《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第36-47页。

^③ Touraj Daryaee (ed), *King of the Seven Climes: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Iranian World (3000BCE-651CE)*, Ancient Iran Series, vol. 4, Jordan Center for Per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17, p. 80.

^④ M. Rahim Shayegan, *Arsacids and Sasanians: Political Ideology in Post-Hellenistic and Late Antique Per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47-290; Glenn Barnett, *Emulating Alexander: How Alexander the Great's Legacy Fuelled Roman's Wars with Persia*, Pen & Sword Military, 2017, pp. 24-42.

^⑤ E. Badian,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2d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pp. 29-43.

^⑥ Plutarch, *Life of Sulla*, V. 7-8.

^⑦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36. 1-3; A. N. Sherwin-White, “Lucullus, Pompey and the East”, in John Anthony Crook, Elizabeth Rawson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X, 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4.

^⑧ Arthur Keaveney, “The King and the War-Lords: Romano-Parthian Relations Circa 64-53B.C.”, *The American*

面对罗马共和国在东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帕提亚帝国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应对罗马人在东方的霸权主义作风^①。加州大学的沙耶甘（M. Rahim Shayegan）认为，传统学者所指出的帕提亚王朝所具有的一系列复兴阿契美尼德王朝政治传统的特征，都是保留阿契美尼德王朝记忆的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祭司书吏集团和希腊罗马作家对帕提亚人入主西亚、建立帝国后进行的主动“唤醒”以及对帕提亚西扩并与罗马爆发冲突的外在“解读”。实际上，帕提亚帝国的“阿契美尼德计划（Achaemenid Program）”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一方主动“构建”和“解读”的结果，但“观念往往会演变为事实，而事实反过来塑造着观念”。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敌意不仅会诱发罗马一方为“模仿亚历山大（Imitatio Alexandri）”举兵东征，也会反过来强化帕提亚人的西亚/波斯正统观念。

随着近东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的确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遗产无疑成为帕提亚王朝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伊朗主义（Iranism）”成为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交往的重要身份宣示^②。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公元1世纪初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二世曾威胁罗马皇帝提比略“直至斯特鲁马河的罗马领土都是帕提亚人应该恢复的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国版图”^③。而帕提亚帝国也的确尝试过恢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黎凡特等东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公元前40-前38年，帕提亚帝国趁罗马共和国在凯撒遇刺后内战刚刚结束，以罗马内战失败后的共和派将军拉比努斯（Labinius）为向导，以大将法纳帕特斯（Pharnepates）辅佐年轻的王储帕克如斯（Pacrus）统帅大军，对罗马共和国的小亚细亚和黎凡特诸行省和附属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拉比努斯率军一直推进到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沿海，而帕克如斯在攻占安条克后一路南下，席卷了除推罗外的黎凡特海岸全部地区，甚至还进兵耶路撒冷推翻了罗马人扶植的犹太国王^④，罗马共和国在东方的统治一时间濒临瓦解。尽管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40-前38年对罗马共和国东地中海领土的入侵以失败告终，但此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统治者将帕提亚帝国视为最大外部威胁则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尽管在文化身份上罗马帝国始终以“无边帝国（Imperium Sine Fine）”自居，但在与帕提亚帝国的交往中罗马人逐渐承认了帕提亚仅次于罗马帝国的东方大国地位，这也成为当时罗马史家公认的事实^⑤。罗马史家塔西佗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就将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描述为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强权（Maxima Imperia）^⑥和“太阳下两个最伟大的国家”^⑦。至公元3世纪初，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公元211-217年在位）在遣使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四世（Artabanus IV，约208-224年在位）请求与帕提亚公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103, no.4, Win.1982, pp.412-428; A. D. Simpson, *The Departure of Crassus for Parthi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38, pp. 532-541.

^① R. J. Ferguson, “Rome and Parthia: Pow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cross Cultural Frontiers”, *The Center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12, December 2005.

^② J. Wolsky, “Die Parther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griechisch-römischen Kultur”, *Klio*, vol. 65, 1983, pp. 137-149.

^③ Tacitus, *Annals*, VI.31.

^④ Flavius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edited by Martin Hammond and Martin Good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I. 8-13.

^⑤ J. A. North,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1, 1981, pp. 1-9.

^⑥ Tacitus, *Annals*, II. 56.

^⑦ Flavius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XVIII. 46.

主联姻时，卡拉卡拉在给阿塔巴努斯四世的信中高度肯定了帕提亚和罗马作为世界两大强权的地位，并认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各有所长，两大强权的联姻将使世界上所有民族和部落屈服在一个权威之下”^①。尽管卡拉卡拉的书信被认为是故意挑起帕提亚战争的手段，但罗马帝国从统治者到历史学家均在不同场合认可帕提亚帝国的东方大国地位，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②。

最后，帕提亚王朝在公元1世纪后面对罗马帝国的“和平演变”，愈益明确表达自己的“非希腊性”和“伊朗性”^③，以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渗透，并以向罗马帝国大力输出帕提亚文化作为反击手段。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达成久违的和平协议，弗拉特斯四世同意归还卡莱战役中夺取的罗马军团鹰旗和战俘，同时迎娶奥古斯都送来的意大利女奴穆萨（Musa）为皇后^④。迎娶穆萨之后，弗拉特斯四世畏惧王室斗争，听从穆萨的建议将自己与其他妃子所生的四个儿子和他们的儿子都送到罗马帝国为质^⑤，只留下和穆萨所生之子弗拉特斯（Phaates V，公元前2至后4年在位）为王储^⑥。公元前2年，穆萨与弗拉特斯王子合谋毒杀弗拉特斯四世，并在将自己的儿子扶上王位并下嫁给儿子弗拉特斯五世后，与后者成为共治君主。此番举动立即引起帕提亚举国哗然，导致帕提亚贵族联手于公元4年将弗拉特斯五世和穆萨废黜。过去的学者认为，穆萨母子被推翻的原因在于其伦理上引起帕提亚贵族的反感。但不管是从内亚游牧民族的“父死烝母”还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最近亲结婚（中古波斯语 Khowēdodah）”传统来看，穆萨母子的行为并无不妥。穆萨母子得罪帕提亚贵族的根源并不在于伦理，而在于女性分享政治权利甚至与男性成为共治君主之传统，不符合古代伊朗政治文化。相反，这样的传统在希腊—马其顿君主中较为多见，尤其是托勒密王朝，其根源在于古代马其顿传统^⑦。此后直到公元12年阿塔巴努斯二世即位，帕提亚贵族多次废立亲罗马的帕提亚君主，其原因就是因为是在罗马生活长大的帕提亚王子们过分浸淫希腊罗马文化，与帕提亚传统格格不入。由于弗拉特斯四世的“罗马化”子孙们均不符合帕提亚贵族的要求，帕提亚贵族最终只能支持帕提亚属国君主出身的阿塔巴努斯二世为王，以续接安息王朝王统。

^① Herodian of Antioch,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Marcus to the Accession of Gordian III*, IV. 10. 4.

^② S. Verosta,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between 100 and 650AD”, *Recueil de cours.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13, Leiden, 1964, pp. 15-18.

^③ Jake Nabel, “The Arsacids of Rome and Parthia’s ‘Iranian Revival’ in the First Century CE”, in Kai Ruffing, Kerstin Dross Krüpe, Sebastian Fink, Robert Rollinger (eds), *Societies at War,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Symposium of the Melammu Project held in Kassel September 26-28 2016 and Proceedings of the 8th Symposium of the Melammu Project held in Kiel November 11-15, 2014*,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Press, 2018, pp. 475-489.

^④ J. P. A. Van der Vin, “The Return of Roman ensigns from Parthia”, *Bulletin Antieke Beschaving*, vol. 56, 1981, pp. 117-139.

^⑤ E. Nedergaard, “The Four Sons of Phraates IV in Rome”, in T. Fischer-Hansen (ed.), *East and West: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World*, Danish Studies in Classical Archaeology: Acta Hyperborea 1, Copenhagen, 1988, pp. 102-115.

^⑥ Tacitus, *Annals*, II.1.

^⑦ Elizabeth Carney, “Women and Basileia: Legitimacy and Female Political Action in Macedonia”,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90, no. 4, 1995, pp. 367-391.

公元 51 年继位的沃洛基西斯一世更进一步拉大了帕提亚帝国和希腊罗马文化的距离，其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将其弟扶植为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一世（Tiridates I, 51-58, 66-88 年在位），同时开始对散佚的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进行重新搜集、编订和整理。沃洛基西斯一世不仅通过从民间搜集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和在自己的钱币上铸以“火坛”图案证明自己是伊朗民族文化的重要复兴者和推动者^①，还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推动帕提亚文化对罗马帝国的反向输出。公元 66 年，经过与罗马皇帝尼禄（Nero, 54-68 年在位）持续数年的军事较量之后，沃洛基西斯一世终于以尼禄加冕提里达特为条件垄断了帕提亚对亚美尼亚王位候选人的选择权。自此之后，亚美尼亚国王一直由帕提亚安息王室成员出任，亚美尼亚形成了另一个“安息王朝”^②。不仅如此，提里达特前往罗马接受尼禄加冕期间，开始了帕提亚文化对罗马帝国的“反向输出”^③。为了彰显帕提亚传统文化，提里达特率领多达 3000 人的帕提亚弓骑兵“使团”奔赴罗马，帕提亚骑兵一度成为罗马帝国境内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尼禄为招待提里达特的帕提亚使团不惜耗费巨资。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提里达特为了尊重琐罗亚斯德教不污染水源的传统，选择走陆路奔赴罗马接受尼禄的加冕，由此耗费了达 9 个月的时间。而尼禄为了彰显自己“皇恩浩荡”，每天花费 80 万塞斯退斯沿途招待帕提亚使团^④。由于提里达特在罗马期间向尼禄大力宣传太阳神密特拉（Mithra）并得到尼禄的大力支持^⑤，密特拉崇拜在公元 1 世纪下半叶迅速传播于罗马帝国^⑥。因此，以沃洛基西斯一世为代表的晚期帕提亚君主不仅成功抵制希腊罗马文化对帕提亚的渗透，而且有力推动了“帕提亚特色”伊朗文化向罗马帝国等周边文明的输出，由此对罗马帝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⑦。

四、余论：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文明交往意义与价值

在帕提亚王朝三大文化属性中，“希腊化”是前期帕提亚帝国统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帕提亚统治精英的政治亲希腊主义。但我们对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不应做机械地片面理解，“希腊化”其实更多是帕提亚帝国统治塞琉古王朝旧土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帕提亚人自身“希腊化”的程度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一些可视化元素和希腊“流行”文化的层面，并没有在族群认同等深層面向发生“希腊化”。而传统学界在解读帕提亚王朝

^① Deb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p. 196; Alberto Simonetta, “The Drachms of Vologases I and Artabanus IV”,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Sixth Series, vol. 9, no. 3/4, 1949, pp. 237-239.

^② C. Toumanoff, “ARSACIDS vii. The Arsacid dynasty of Armenia”,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II, Fasc. 5, 1986, pp. 543-546.

^③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LXIII. 1. 2.

^④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LXIII. 2.

^⑤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LXIII. 5. 2; Pliny, *Natural History*, XXX. 6. 17; R. C. Zaehner, *The Teachings of the Magi, A Compendium of Zoroastrian Belief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 p. 109.

^⑥ Erik M. Orlin, *Foreign Cults in Rome: Creating a R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2-57.

^⑦ R. James Ferguson, *Roma and Parthia: Pow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cross Cultural Frontiers*, The Center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Research Paper No. 12. Robina, Queensland: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ond University, 2005, pp. 76-87.

“内亚性”的路径上多从游牧民族的一些常见习俗入手，没有从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深入探讨帕提亚王朝的“内亚性”。其实，帕提亚王朝的“内亚性”不仅反映在起源、钱币和军事体系上，也反映在其王位继承中“横向继承（兄终弟及）”传统对“纵向继承（父死子继）”传统的侵蚀上。帕提亚王朝王室各支成员围绕王位的长期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可归因为来自内亚的横向继承和贵族辅政传统的强烈影响^①。塔西佗曾记载帕提亚人有以马匹祭祀河流的习俗^②，这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水神（Tir）崇拜，而以大量的战马殉葬和祭祀也是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马萨格泰人的共有文化传统。因此，帕提亚王朝的“内亚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的古典学视角，对帕提亚文化中的琐罗亚斯德教因素与欧亚草原游牧民的“内亚”文化与制度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而受到内亚文化影响的帕提亚战术系统本身在古代西亚军事史上也具有革命性。自帕提亚王朝以后，重装骑兵成为萨珊王朝乃至中古诸波斯化伊斯兰王朝的军事主力^③。而身披全套具装铠甲的骑马武士成为中古以降波斯乃至伊斯兰贵族的标准形象，以及中古波斯—伊斯兰绘画的重要主题^④。从这个意义上看，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的“内亚性”也丰富和深化了中古波斯贵族文化的内涵，最终成为萨珊帝国“伊朗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探讨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特征时，我们不应该将帕提亚的“内亚性”与“伊朗性”特征完全割裂开来，即避免脱离伊朗文明自身发展规律来讨论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并将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族群完全视作来自伊朗高原外部的游牧征服者。实际上，东伊朗语游牧人与西伊朗语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属古代伊朗文化圈，故斯基泰人的“内亚性”本身也是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正反两面。帕提亚人在继承阿契美尼德和中亚伊朗传统的同时，扮演了东部伊朗文化（中亚的游牧伊朗文化）和西部伊朗文化（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定居伊朗文化）融合者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内亚”身份重新型塑了后阿契美尼德时代伊朗文化。如扎林库伯所言，“帕提亚人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与东部伊朗人的传统有密切联系。这种传统则是凯扬王朝和雅利安故土（Aryānam Vaejo，指古代印度—伊朗人共同体分离前在中亚的居住地）时期的遗产，它比米底和波斯传统更久远”^⑤。实际上，帕提亚人通过把西部伊朗人已经遗忘的古代印度—伊朗游牧人传统重新输入伊朗高原，最终形成了构成中古波斯文化之基础的以贵族勇士文化为核心的“帕提亚特色”伊朗文化和艺术流派。因此可以说，帕提亚时期奠定的中古波斯艺术正是所谓“伊朗（Erān）”与“图兰（Tūrān）”文明交往的结晶^⑥。正是在帕提亚时期，形成了以吟游诗人口头创作为代表的帕提亚文学，最终在中古时期为《玛斯纳维》和《维斯与拉明》（*Vīs u Rāmin*）等脍炙人口的波斯文学作品提供了最坚实的素材

^① David Sneath,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g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39; Thomas J. Barfield, “Tribe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Inner Asian Perspective”,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ited by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96-105.

^② Tacitus, *Annals*, VI. 37.

^③ M. Mielczarek, “Cataphractari and Clibanarii”, *Studies in the Heavy Armoured Cavalr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dz, 1993, pp. 68-82.

^④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

^⑤ [伊朗]阿卜杜勒·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第323页。

^⑥ Ali A. Jafarey, “Iranians and Turanians in the Avesta”, *The Zarathushtrian Assembly*, California: Buena Park, 2007, 访问时间，2019年8月24日。

①。帕提亚人通过对自己征战、耕作、游牧、狩猎、聚会和宫廷生活的口头传唱，为萨珊王朝时期波斯诗歌和官方史志《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以及后世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Shāhnāme*）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可以说，中古伊朗贵族社会的形成正式奠基于帕提亚时期。因此从长时段历史发展来看，帕提亚帝国最核心的文化属性和文明发展趋势，应该是继承自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传统的同时吸收融合了内亚伊朗游牧人传统的“伊朗性”，即帕提亚帝国自身的伊朗渊源及其对中古波斯/伊朗文化的塑造。而从艺术角度看，帕提亚王朝在对古代西亚王权艺术表达方式的重拾中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同时为萨珊王朝王权艺术形象的确立奠定了诸多核心元素，如从骑枪决斗和狩猎等题材均可发现萨珊艺术的帕提亚渊源。另外，帕提亚诸王追述阿契美尼德传统，也在贝希斯敦山岩上开凿了不少纪念性岩刻。尽管这些岩刻遭到早期萨珊君主的大肆破坏，仍可以从中窥见帕提亚国王骑马征战、击杀敌人和从琐罗亚斯德教神祇手中接受神圣王权的形象^③。帕提亚时期的纪念性岩刻在继承阿契美尼德传统的同时，结合帕提亚人自身的“内亚”特色重塑了伊朗王权的视觉形象。因此，不管萨珊王朝如何抹去帕提亚王朝的统治印记，也无法否定帕提亚王朝为萨珊王朝奠定的艺术表达方式，因为这就是萨珊王朝纪念艺术风格的直接来源^④。正如 20 世纪前期“希腊化”研究权威罗斯托夫采夫所指出的那样，“萨珊王朝初年丰富的纪念性岩刻与帕提亚时期同类作品的稀缺给后人留下一种假象——即是萨珊王朝复兴了伊朗民族文化。而真实的情况是，萨珊艺术的支柱是帕提亚艺术，萨珊波斯人正是通过帕提亚人学会了波斯阿契美尼德艺术的核心表达方式”^⑤。

综上所述，传统学界强调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特征对于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文化本质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腊化”仅仅是帕提亚帝国文化万花筒中的一个光谱，并不能完全代表帕提亚帝国的核心主流文化及其发展趋势。“希腊化”仅仅是帕提亚王朝前期的文化宣传手段和帝国政策工具，而承继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伊朗性”特征则是帕提亚王朝的主流和根本文化发展趋势，并对萨珊王朝以降中古波斯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帕提亚帝国的上层贵族的确曾经对希腊文化有所青睐，但帕提亚人的希腊化特征并未深入到族群认同等深层面。而随着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帕提亚在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帕提亚王朝离“希腊化”渐行渐远，反而愈益强化自身的“伊朗性”。通过大力支持和复兴继承自阿契美

① Mary Boyce, “The Parthian Gosan and Iranian Minstrel Tradition”, pp. 10-45; Jalāl al-Dīn Rūmī, and Alan Williams, *Spiritual Verses: the Book of the Masnavi-ye Manavi*. London: Penguin, 2006, p. 19; V. Minorsky, “Vīs u Rāmīn: A Parthian Romance”, revised version, in *Iranica: Twenty Articles*, Tehran: University of Tehran Publications, 1964, p. 180.

② Barbara Kaim, “Women, Dance and the Hunt: Splendour and Pleasures of Court Life in Arsacid and Early Sasanian Art”, in V. S. Curtis, Elizabeth J. Pendleton, Michael Alram and Touraj Daryaee (eds), *The Parthian and Early Sassanian Empires: Adaptation and Expansio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in Vienna, 14-16 June, 2012*,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Series, 2016, pp. 90-108; Shapur Shahbazi, “On the Xwaday-Namag”, *Acta Iranica: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Ehsan Yarshater V XI*, 1990, pp. 218-223.

③ Vanden Berghe, Louis. *Relief Sculptures de Iran Ancien*, Bruxelles: Parc du Cinquantenaire, 1983-1984, p. 45.

④ Trudy S. Kawami: *Monumental art of the Parthian period in Iran*. Brill, Leiden, 1987; Hans Erik Mathiesen: *Sculpture in the Parthian Empire*, Aarhus, 1992.

⑤ M. Rostovtzeff, *Dura Europos and Its Art*, Ams Pr Inc, 1938, p. 296.

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统治观念和琐罗亚斯德教伊朗文化，帕提亚帝国最终为萨珊波斯帝国时期伊朗文化的繁荣鼎盛奠定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因此，在帕提亚帝国的文明交往进程中，“希腊化”虽然曾经风行一时，但“伊朗性”及以之为载体的中古波斯/伊朗族群、宗教与文化传统才是辨别帕提亚帝国文化归属和文明交往特征的核心标识。因此，帕提亚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适度继承传统希腊化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伊朗文明自身历史发展规律，综合利用西方古典学、伊朗语言学、近东考古学和内亚研究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帕提亚帝国对中古波斯/伊朗文明的影响，也即重新发现和阐释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并让这个长期被视为伊朗历史上“黑暗时代”的帝国真正褪去神秘的面纱，使其成为古代伊朗文明交往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A Reconsideration of Iranism Comparing Hellenism : A Debate on the Fusion and Divergence of the Divers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Parthian Empire

Long Pei

Abstract: Among the thre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Parthian Empire, the depth and importance of "Hellenism", "Innerasianess" and "Iranism" are different. "Hellenization" was only a popular foreign culture for the Parthian Empire, while "Innerasianess" and "Iranism" wer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and intertwine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Parthians'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ranism" is embodied in the Parthian Empire in the fields of coins, images, inscriptions, architecture and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rule of the Achaemenid dynasty of Persian tradition an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nomadic Iranian culture of Inner Asia, the duration and influence of "Hellenization" on the Parthian Empire far exceeded the influence of "Hellenization". Therefore, "Iran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of the Parthian Empire. The Parthian Iranian culture had a very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and ancient Persian/Iranian culture, and its value should not be obscured by the traditional Hellenistic research paradigm.

Key Words: Parthian Empire; Cultural Identity; Iranism; Hellenism; Innerasianess